

##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的 两个中国传统医学研究项目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亦大幅增加。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用于支持相关研究的总经费达到 12 亿,获得研究经费资助的项目不断增多。在如此前所未有之大好形势下,科学史界的同道应对该基金的资助范围和支持强度有所了解、积极参与,从而使得以学术性、基础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研究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段中,一次性获得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从而实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与深度的目标——凡获批准之重大项目的资助强度为 80 万,且可申请“后续研究的滚动支持”;某些申报同一题目者,如被认定视角不同、言之成理、另有研究价值,亦有可能作为略低一级的“重点项目”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

由于评委严格遵守评审制度,所以尽管在评审会场见到几位分属不同组别的专家,但彼此间的言谈话语并不涉及各自负责评审的项目与内容,也不知道最终有哪些申报的项目获得了资助。然因近日分别参加了两个获批重大项目的“开题会”,故可稍加介绍以资参考。从总体上讲,这两个“中国传统医学”方面获得资助项目的基本特点,可以概之为“由内及外”与“由外及内”。

### 1 简帛医书综合研究

首席专家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张显成教授,参加者包括“文字”和“医史”两界的若干学者。

属于秦汉时期的出土医学简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出土地点分布广泛,为全面研究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医学基础理论奠基与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重要资料。然而,大量相关资料的出土,毕竟是在比较晚近的几十年中;其二,由于医学属于一个比较专门的独立学科,因而并未被一般史学研究者充分纳入整体文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其三,医学史专业研究者除了受文字学研究水平的制约外,在思想上较难突破固有“定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诸多经典在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的束缚,且大多是将出土于不同地域的秦汉简帛及传世医书视为一脉相承的体系。从而形成了“古代科技知识领域中,医学超前发展、两汉四百年反而趋于空白”这样一种并不能够客观、准确反映历史本貌的虚构图像。这一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将以文字学的研究为基础,进而拓展到古代医学在广袤土地上如何多元独立发生与成长,如何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下,经过扬弃融合始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更加注重从史学视角出发,牢牢把握“时”、“空”两个维度上之宏观图景的构建;具体落实与体现该项目“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有所创新”的预设目标;成为补足现有秦汉史研究尚嫌不足之一面的重要环节。

### 2 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化转型

首席专家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王旭东教授,参加者包括“中医”和“哲学”两界的若干学者。

与上述以秦汉时期简帛文字考证为基础,进而拓展到知识体系解读(由内及外)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本项目更多关注的至今仍然存活并服务于国民卫生事业之传统医学的现实问题。然而若欲从“文化”、“价值”、“转型”三大方面将问题阐述清楚,还是离不开史学性分析(由外及内)。首先,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诚如课题组所言“文化”属于涵括诸多人类所创造之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上位概念”,但对

于研究“文化”者而言通常还是需要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加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比较性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在具体到“中医”这一知识体系时,文化便不再是“上位概念”,而是在哲学、宗教、宇宙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影响下所形成的与认知生命、治疗技艺、医德伦理等密切相关的“下位概念”了。其二,就“价值体系”而言,则一方面需要历史性地分析不同时代的医学价值观及其演变。例如,在较早时期被称之为“君子不齿”的“百工贱业”之一(治病工);其后渐有“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仁政之一端”的看法;宋代之后则有视医学为儒者“格物穷理之一端”的说法,并相应地出现了重视医学理论研究的学风之变。另一方面,要想说明当现代生物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与普及时,传统医学何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则必须对两种不同医学知识体系进行十分具体的比较,分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其三,考察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转型”时,除了批评过分强调“科学化”、外在形式方面的牵强附会所带来的无益转变,同样需要非常具体地分析自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传统医学内部所发生的潜移默化、主动、被动、折衷等四种不同类型的转变,并客观地评价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结果。

1958年,首席专家所在南京中医学院曾开创性地领衔编撰了以《中医学概论》为首的一系列高等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教材。我以为:此次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实施,完全有可能再创辉煌——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文化、价值与转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